



城市史
译丛

Kensington Market:

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History and Toronto's Urban Landscape

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

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

李 娜 著/译

上海三联书店

Kensington Market:

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History and Toronto's Urban Landscape

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
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

李 娜 著/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 / 李娜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2

(城市史译丛)

ISBN 978 - 7 - 5426 - 5870 - 8

I. ①集… II. ①李…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多伦多
IV. ①TU984.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8378 号

**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
变迁**

著 译 者 / 李 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870 - 8/C · 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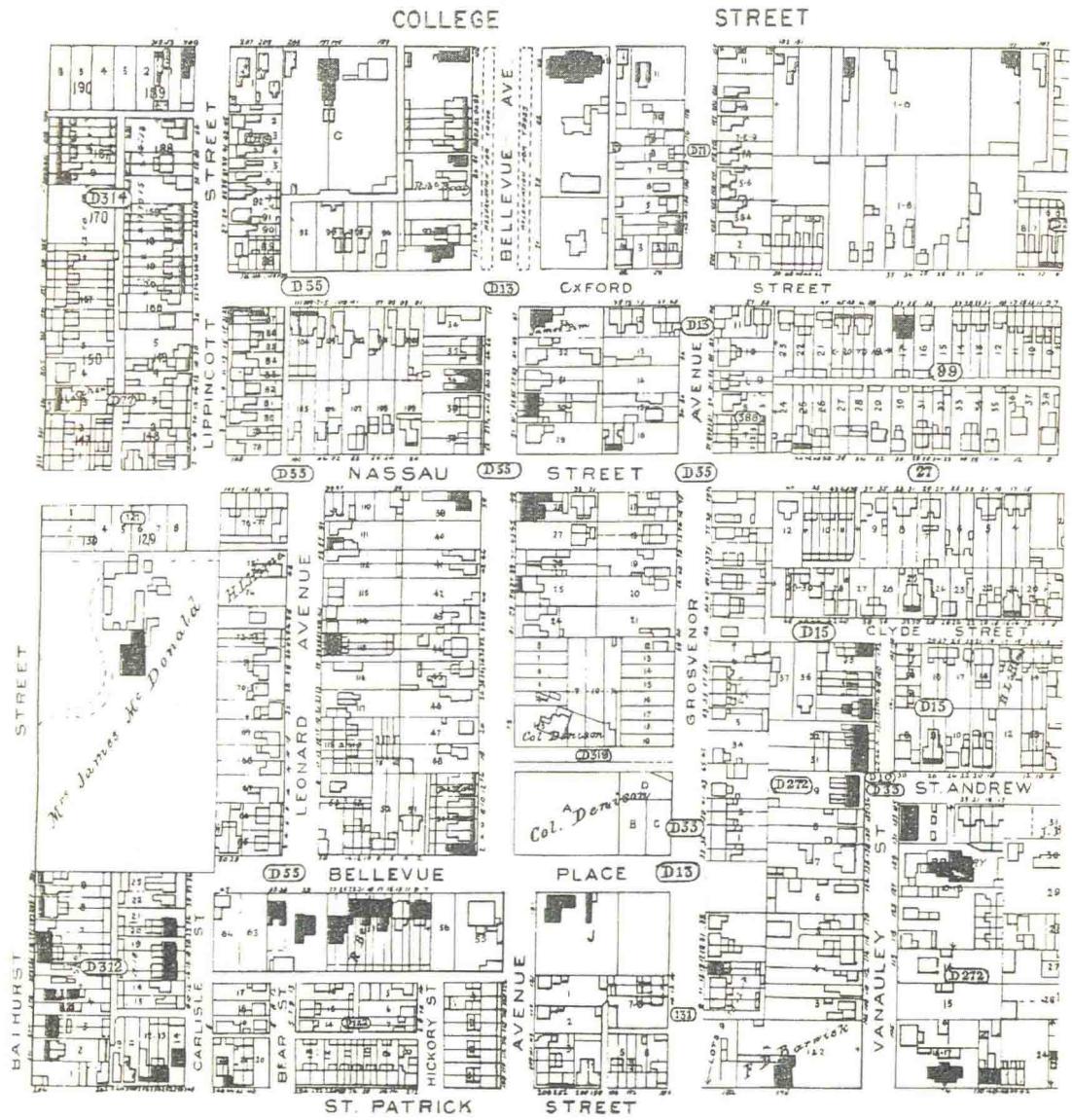
定 价 / 52.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2351

城市史
译丛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美国公众史学研究”（课题编号 14XSS007）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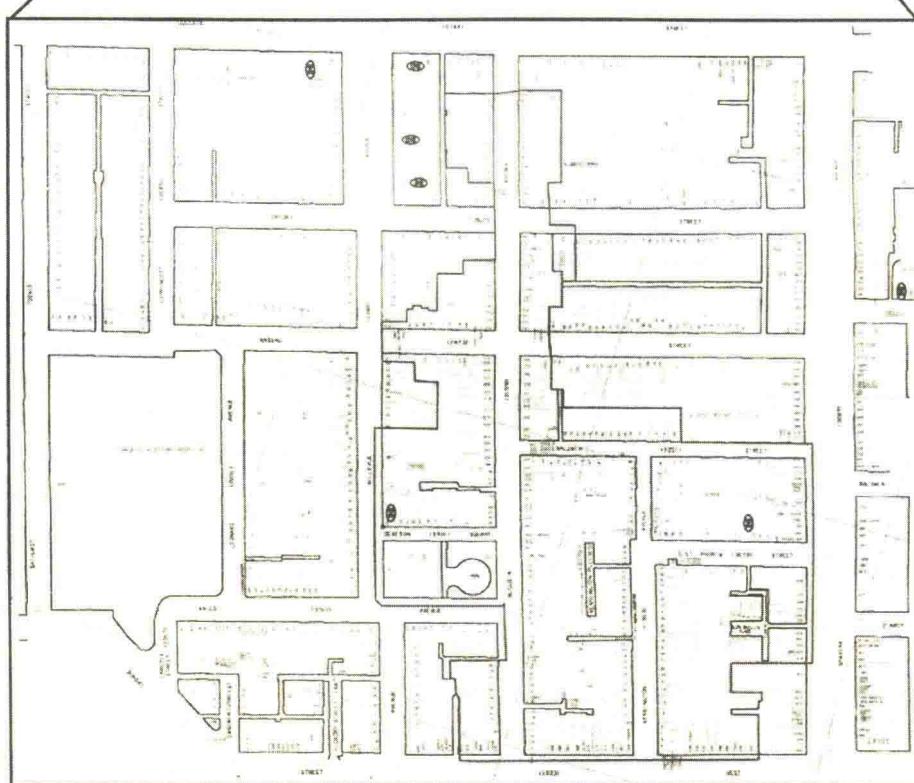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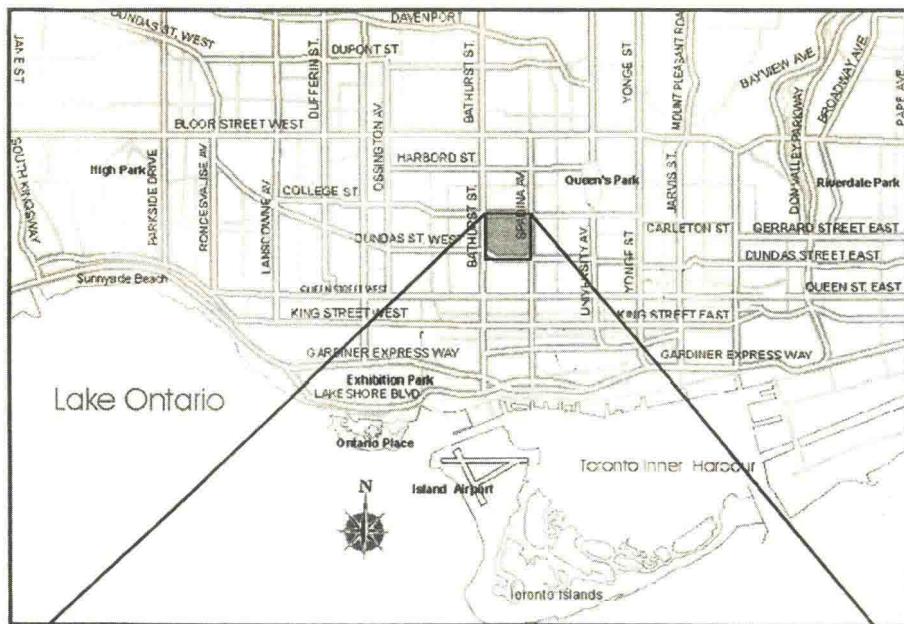
本书原以英文写作，由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于 2015 年出版，中文版由作者译出



1884 年肯辛顿地图

肯辛顿街(原凡纳列街 Vanauley Street); 奥古斯塔街(原格洛斯文纳街 Grosvenor Avenue); 鲍德温街(原格莱德街 Clyde Street)。

资料来源: Goads Atlas, 1884。



肯辛顿区域图

资料来源：Andrew M. Waldron, "Kensington Market, Toronto, Ontario," HSMB, Submission Report 2005-30, 2005.

言

为了探寻城市存留的历史脉络,为了读懂生命沉淀的印痕,我走遍了这里的每一条街巷,记录下那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民间建筑——她们或已凋敝,或已被废弃,或已被遗忘。但是,正是这些普通的邻里街区讲述着真实的历史,启示着我们发掘城市的个性与深意,并赋予城市的建筑与景观丰富的情感内涵。很多时候,这些地方已成为现存城市形态的有机组成,与之水乳交融,似和谐而奇妙的乐章,然而,她们的历史真正被保留下来了吗?

董孝孙(Anthony M. Tung)^①

自2002年起,我开始探访世界各地的主要历史城市,寻找存留的历史遗址遗迹。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城市的历史建筑与景观正在逐渐消逝,而是否为未来的城市保留这些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建筑实体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通过比较、借鉴不同国家与不同文化的历史保护实践,我期待着能发现一些规律和逻辑,能找到在“现代化”藉口下城市破坏的解决方案,从而能更有效地保护城市历史。

在意大利的罗马,我目睹了古罗马强大的文明与其建筑技术与艺术价值相辅相成,历史保护如何第一次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在法国的巴黎,名人故居与地标建筑水乳交融,完美地结合,形成记忆景观(*paysages des memoires*)。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经济适用房的出现促使城市历史保护与社

^① Anthony M. Tung, *Preserving the World's Great Cities: The Destruction and Renewal of the Historic Metropolis*, New York: Clarkson Potter, 2001, p. 11.

会改革及公共卫生携手。在美国，著名的 66 号历史公路(route 66)联接着美国中西部的工业枢纽芝加哥和享有“牛奶与蜂蜜之地”美誉的洛杉矶，公路沿途的历史遗址、遗迹、纪念碑、登录的历史路线以及地标性建筑，无一不将历史带回现实，在这些地方通过大众文化和艺术所讲述的公众历史更是丰富而生动。在印度的德里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宗教成为历史保护的强大驱动力，推翻了“只有经济高度发展，才能开始谈历史保护”的论断。在新加坡，旅游开发与历史保护息息相关，为经济利益而包装过去与历史的原真性之间其实有章可循，不一定非此即彼。在日本的京都，东方的建筑技艺在周期性的重建过程中体现着与欧美建筑截然不同的原真性，历史街区不仅仅体现着建筑的区域特色，还呈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风情。

在很多地方，我亲历了城市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创新的博弈中衍生的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传承。于是，历史不再是那个遥远的、毫不相关的过去，而变得触手可及，可感可知。然而，更多的时候，当飞机徐徐降落在我计划研究的城市，当我期待着亲眼目睹那些我从书本中学到、档案中查到、老照片中品味到的历史建筑和景观时，我发现我来迟了，那些曾让我魂牵梦萦的、承载着独特记忆与历史的建筑、遗址、纪念碑、街区已经永远地消逝了。

2006 年的夏天，我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或主动选择，或情形使然，来自世界各种族群、不同文化的人带着对彼岸的憧憬，纷纷来到北美这座著名的多元文化中心城市，开始新的生活。^① 两年后，我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也因此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座有着 170 多年历史的城市，现代性与历史感如此和谐地共存，时间在这里像是用彩笔刻画的光泽，色彩斑斓、质地柔和。也正是在这里，我对城市历史遗址遗迹的研究方向开始改变：我不再只沉浸在那些宏大显赫的建筑中，也不再只局限在众所周知的历史街区里。我开始关注城市里那些毫不起眼的民间建筑和乡土景观，对普通人根植其间的记忆、故事、奋斗、期待与梦想深深着迷，我似乎发现了代表这个城市真实历史的原始资料。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要发掘并读懂这些素材。这本书就是关于多伦多市区最古老的街区之一——肯辛顿，讲述一个世纪以来，她的历史与记忆，她的信念与梦想，她的建筑与景观的变迁。

本书的英文版于 2015 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北美城市规划学

^① Michael Kluckner, *Toronto, the Way It Was*, Toronto: Whitecap Books, 1988.

和公众历史学界的积极反响，普遍认为这项研究对探索北美主要城市的历史景观作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贡献。“该书巧妙地融激情和信念于严谨的学术研究，肯辛顿的历史、记忆和景观传递着独特的地域感知。城市景观的保护规划不再只遵循官方的、理性的程序，而是体现着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叙事的、且赋予情感的公众历史。”^①“该书通过严谨的档案文献和实地研究，深刻而又生动地讲述了肯辛顿的历史、机遇、记忆和景观的变迁。熟悉肯辛顿的人在这里能深切地感受到肯辛顿的丰富多彩与内敛厚重，因为书里记载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个世纪里的喜怒哀乐。”^②的确，从一开始到最后成书，“本地视角”(local perspectives)一直是这项研究的核心，我也在研究过程中从一个“局外人”变成“局内人”。

当2009年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关于肯辛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移民与多元文化；二是建筑描述、整理和记录。几乎还没有研究将两方面联系起来并作深入分析。另一个问题则涉及研究的参照框架，即“局外人”无法完全解析“局内人”的地域感知(sense of place)和历史感知(sense of history)，如罗伯特·哈尼(Robert Harney)所言，对“族群街区”(ethnic neighborhood)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一种是通过挖掘城市档案文献，作社会科学的量化分析；另一种则侧重概念与理论，作质性分析，深入到移民的心理世界，包括他们精神栖居。^③遗憾的是，关于后者的深入研究几乎为零。虽然在1980年代左右，加拿大的学者也做过一些口述历史，但这些资料不仅分散、不系统，而且对肯辛顿居民的记忆与他们居住的环境变迁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集中在肯辛顿居民的情感世界与城市景观之间的演绎，拓展和深入城市历史保护研究。

为什么关注以多伦多为代表的北美主要城市的历史街区？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和保护规划有什么现实意义？我在2010年的《从公众史学看城市历史景观》一文中，取样分析了中国主要的历史文化街区，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历史的原真性、集体记忆以及保护法规等问题，发现尽管东西文化存在差异，但历史保护却面临相似的问题，因此，我第一次提出了“具有文化敏感性之

① Brian Osborne,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Queen's University.

② Carlos Teixeir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kanagan.

③ Harney and 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o., 1985, p. 11.

叙事方法”(a culturally sensitive narrative approach)：“共享历史话语权，给居住在历史街区的人们机会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解读他们熟悉亲切的环境，对公民对话和公众参与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似乎具有前瞻性，但我相信，具有文化敏感性之叙事方法——将城市景观与公众历史连接——代表着城市历史保护的发展方向。”^①当时，正值多伦多 176 岁生日，我关于肯辛顿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同时也发现在理论上认知的东西，在实践中需要不断调整。这似乎印证了公众史学是一种反思性的历史实践，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些反思的片段、实地研究与理论的距离、在现场(the field)遇到的挫折或惊喜，系统地呈现给读者，这不仅对理解本书的逻辑有所帮助，也希望为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历史保护实践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希望以此为契机，拓展和深入我们对 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的理解，并回答一系列十分重要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2013 年末我回到中国时，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关注公众史学，这促使我反思这一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演进与发展历程，在不同文化里的解读与诉求，以及对中国发展公众史学的借鉴意义。最根本的，公众史学应该如何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走出自己的路。没有实际案例的理论探索往往是破碎和不完整的，仅仅靠翻译也无法支撑一个学科的建设，倘若没有高质量的案例，仅引入抽象的概念或某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命题，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众史学”。因此，本书针对中国读者作了部分改写，加深了理论部分，强化了方法论，旨在为公众史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些切实的指导。每一章的内容自成一体，附有较为详尽的文献，读者可以此为线索，进行扩展阅读和研究。

这项研究是城市规划学与公众史学的跨学科关注，也是理智与情感并重的旅程。时光荏苒，一瞬间的勇气似乎延续了好多年，但我发现十余年来自己关注的城市历史保护最核心问题始终没有改变，这本书便是当年那信念的执着。

在加拿大，肯辛顿的居民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关于肯辛顿的智慧，为我的研究和成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安大略省犹太档案馆(Ontario Jewish

^① Na Li, “Preserving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no. 4, 2010, p. 51–61.

Archives)的史蒂芬·斯贝斯曼(Stephen Speisman)基金赞助了我在多伦多的实地调研。多伦多市档案馆(Archives of Toronto)、安大略省档案馆(Ontario Archives)、安大略省遗产信托基金会(Ontario Heritage Trust)、加拿大国家公园局(Parks Canada)等机构对这项研究给予了各种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史蒂芬·海伊(Steven High)教授,他为我提供了在康科迪亚大学“口述历史与数字叙事中心”(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作口述历史研究员的机会,在那里我使用口述历史工具软件Stories Matter处理了本研究的口述访谈资料,并更深入至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在解构城市历史空间中的对话。

在美国,我的博士导师理查德·托佩尔(Richard Taupier)教授慷慨地资助了我在马萨诸塞大学的博士学习。理查德不仅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地指导我,而且在精神和生活上也提供了无限的支持。我至今还记得当我在云南探访大理古城时收到马萨诸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也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长长的信,那封信里的鼓励和期望一直伴随着我接下来在美国攻读城市规划学博士的岁月。本研究最初的理论框架在伊丽莎白·汉敏(Elisabeth Hamin)教授的“城市规划学理论”高级研讨课程中成形。她的洞见与学识深深影响了刚刚进入美国学术界的我,我能在传统的城市规划学理论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并提出“具有文化敏感性之叙事方法”得益于她的悉心指导。

这项研究跨越了城市规划学与公众史学,我幸运地得到了马萨诸塞大学的景观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历史系公众史学项目的教授、同学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马克·汉敏(Mark Hamin),帕特里夏·麦格尔(Patricia McGirr),罗伯特·莱恩(Robert Ryan),杰克·艾亨(Jack Ahern),戴维·格拉斯博格(David Glassberg)和玛拉·米勒(Marla Miller)教授。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戴维和玛拉两位教授,他们仔细了阅读了本书第一版文稿,提出了很多犀利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指导和建议极大提高了本书的写作质量。戴维在1980年代创建了马萨诸塞大学的公众史学项目,接下来的三十余年里,这一项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美国高校里以严谨的学术和活跃的实践而闻名的公众史学项目。戴维的远见与学识,谦和的为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他在2007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鼓励我选修历史系的公众史学的课程。玛拉不仅影响了我的史学基本观,还在课堂和实践项目中教会了我公众史学中的人性,让我懂得在历史走向公众的过程中,公众史学应该有学识服务于公众的谦

卑；应该是严谨、诚实、激情飞扬的求真实践；应该关心民间的建筑和记忆；应该有勇气和能力面对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应该在历史教育中不避讳有争议的话题；应该在平等、自由的空间里实现公众参与。若没有他们投入的时间、精力与耐性，我不可能接受并完成严格、完整的公众史学训练，并将这些技能与方法整合到城市历史保护研究中。

在北美的求知之旅并不孤单。这些年我独自走访了很多国家的历史街区，渐渐地，我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如果我真正能以宽容的心境去面对这些建筑与景观，它们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我对城市历史的感知。董孝孙先生的《城市历史保护：世界历史城市的破坏与更新》自2002年开始便伴随着我研究不同文化中历史保护的实践。^① 2008年，董先生与我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陶沙市主办的国家历史保护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的年会上不期而遇。很自然的，我们一见如故，畅谈城市历史保护的种种问题与挑战。这之后每次我到纽约，我们都会见面，他还带我走访了曼哈顿市区的很多历史建筑与街区，讲述她们的历史，并不断挑战我、激励我在历史保护研究中突破陈规，这些犀利的洞见和不懈的鼓励极大地支持我完成本书的写作。

我也要感谢在旅途中每一个走进我研究的人，他们宽容地接纳我，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记忆与故事，使我真正成为他们生活、历史、文化的一员。这些经历让我变得富有，也深深影响了我在北美的学习和研究。我开始关注民间建筑与公众记忆，开始从公众史学的视角去解读并建构城市历史，开始思索新的历史保护方法。我早年在四川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所接受的严格的语言训练，以及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化专业所积累的知识，都为后来完成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友谊也是这项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往返美国和加拿大的调研旅程中，我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的博士同学们给予了慷慨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两位挚友，他们远在荷兰和中国，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选择了不同的生活，但有着很多共同语言。一位是我在荷兰的亲密朋友詹姆斯·布罗内斯(James Broens)先生。我们相识十余年，自我

^① Anthony M. Tung, *Preserving the World's Great Cities: The Destruction and Renewal of the Historic Metropolis*, New York: Clarkson Potter, 2001.

开始在美国攻读博士起,詹姆斯便一直激励我,还资助了2007年我在法国和荷兰的景观建筑实地考察。另一位是董峰先生。董峰是我在上海念书时结识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城市与文化。2009年春天,他邀请我一起沿着美国66号公路旅行,在那段旅途中,我对美国的历史保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创作的灵感亦源源不断。

关于对本书的翻译,我也要作必要的交代。本书英文版共收入40幅插图,中文版又增加了39幅,总共79幅。另外,我还加入了若干我自己拍摄的肯辛顿的照片,作为国内读者参考。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张菁和肖希两位博士研究生,以及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靄畋老师提供了第七、八、九章的翻译初稿,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一颗追梦的心和实现梦想的坚持;他们教会了我终生学习的理念和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这些年,无论我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默默地支持我,他们的关爱陪伴着我漫长的研究和写作之旅。感谢王亮,我的挚爱,他总是能发现最好的我,总是鼓励我为梦想尽心竭力。他伴随着我在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旅程,不断挑战我,是他让这一切更有意义。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先生。

李 娜

2014年12月于美国旧金山定稿(英文版)

2015年12月于中国重庆定稿(中文版)

CONTENTS**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为谁保护历史?	10
第三章 集体记忆与多重地域感知	25
第四章 城市规划学的“沟通转向”	45
第五章 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	60
第六章 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城市景观：城市公众史学	74
第七章 肯辛顿：缘起、演进与更新计划	85
第八章 官方与民间的博弈：城市街区与文化隐喻	109
第九章 记忆、怀旧与肯辛顿	128
第十章 从“记忆之所”到“记忆景观”：根植于地域的智慧	168
第十一章 结语	185
附录一	197
附录二	200
附录三	201
征引文献目录	204

CONTENTS**图
表
目
录**

■ 保护规划与公众史学视角之比较	22
■ 集体记忆的媒介功能	32
■ 肯辛顿更新计划的利益相关各方	105
■ 肯辛顿的记忆场所与代表景观	132
■ 肯辛顿研究中的解释性政策分析	187

CONTENTS**插
图
目
录**

■ 1884 年肯辛顿地图	1
■ 肯辛顿区域图	2
■ 肯辛顿标识	86
■ 多伦多市贝拉维尔房产建筑分块规划图	87
■ 肯辛顿在多伦多市的位置图	89
■ 1913 年的贝拉维尔广场	90
■ 威尔士街的联排建筑	90
■ 肯辛顿第一批犹太裔商人	93
■ 奥古斯塔街与拿索街转角处	95
■ 土巴丹拿大街的建筑与街景之一(约 1950 年代)	96
■ 土巴丹拿大街的建筑与街景之二	96
■ 肯辛顿的露天集市氛围	99
■ 肯辛顿更新计划的范围	102
■ 肯辛顿规划方案(第一阶段),1962 年	103
■ 肯辛顿规划方案(第二阶段),1967 年	104
■ 肯辛顿历史登录的标识	110
■ 肯辛顿历史街区的范围	112
■ 肯辛顿街 2 号	114
■ 肯辛顿街的建筑风格	114
■ 肯辛顿街最初的居民建筑	115
■ 1922 年的鲍德温街景	115
■ 今天的鲍德温街景	116
■ 肯辛顿街与鲍德温街的十字路口	116

■ 鲍德温街 176 号	117
■ 肯辛顿街 52—54 号的北部墙面涂鸦	119
■ 奥古斯塔街 190 号南部墙面涂鸦	120
■ 鲍德温街与奥古斯塔街的十字路口	120
■ 肯辛顿街 18 号(约 1922 年)	122
■ 肯辛顿街黛克女士家的后院	123
■ 1910 年的肯辛顿街	124
■ 士巴丹拿大街与鲍德温街的十字路口	125
■ 奥古斯塔街 255 号	125
■ 朝向东面的诵经台	134
■ 基辅会堂南部立面原始设计图	136
■ 基辅会堂南部立面	137
■ 基辅会堂西部立面原始设计图	137
■ 基辅会堂西部立面	138
■ 基辅会堂的内饰	140
■ 基辅会堂窗户细节	141
■ 基辅会堂第二层的女性集会区	142
■ 刻在基辅会堂南部立面的哈利·利特瓦克夫妇的名字	143
■ 哈利·利特瓦克夫妇的照片	143
■ 基辅会堂内部的纪念匾额	143
■ 基辅会堂历史登录的标识	144
■ 本·锡安·海曼在位于士巴丹拿大街 371 号的“海曼书店与艺术品商店”	146
■ 海曼书店的内部环境	147
■ 本·锡安·海曼在海曼书店里(年代不详)	147
■ 1930 年代海曼书店的外饰	148
■ 1948 年,古里昂·海曼在海曼书店的门口	148
■ 1921 年,罗茜·格林、罗茜·利伯曼、亚伦·拉多夫斯基、 萨拉·拉多夫斯基在联合面包坊餐厅门口	152
■ 达士街与士巴丹拿大街的十字路口	152
■ 联合面包坊餐厅的第二代与第三人	153